



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公益项目

Public service project of Beijing Gender Health Education Institute

艾滋病干预：经营者的参与和需求座谈会 特刊

分享与交流

SHARING AND COMMUNICATING

（内部交流资料 请勿擅自转载）

Interior communicative references and reprinting is forbidden without authorization

艾滋病干预： 经营者的参与和需求座谈会

发 言 纪 要

2007年5月12日 南京



前言

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性与健康中心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经过积极筹备，并委托南京中天娱乐宫承办，于2007年5月12日在南京举办了“艾滋病干预：经营者的参与和需求座谈会”。

这个座谈会还得到了国家CDC性病防治中心的大力支持。

来自江苏、安徽、河南（郑州）、浙江（杭州）、四川（成都）、上海、北京、天津八个省、直辖市的MSM社群活动经营场所（酒吧、浴室）的经营者30余人，热情的应邀参加了座谈。

会议还邀请了UNDP项目官员司马杰、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公民社会项目官员甄甲、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秘书长罗玫、中国公安大学的荣维毅教授、著名学者和作家童戈、全球基金第五轮国家项目办项目官员蒋宁参加了座谈与交流。

另外，因病不能到会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夏国美教授，也委托助手参加了座谈会。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性与健康中心主任毛燕凌组织了专家的接待和交流。

还有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省市CDC专业人士旁听了座谈。

座谈会由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主任郭雅琦、南京中天娱乐宫经理周先生、著名学者童戈联席主持。

这是国内第一次组织MSM社群活动场所的经营者讨论交流他们参与艾滋病干预的需求和经验。尽管会议的时间是星期六，是商业经营的“黄金时段”，但为时一天的

座谈，没有人中途退席，会场秩序井然有序，大家的发言和讨论非常积极、热烈，紧凑，畅所欲言，讨论了许多他们参与艾滋病干预的深层次需求和问题，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宝贵建议，表现出了“同志”活动场所经营者参与艾滋病干预的极大热情。

虽然，这个座谈会的内容将在童戈独立主持的一个调查项目中加以分析研究，我们为了及时的传达出经营者的意见和建议，并以资源共享的目的，使大家更多的关注、了解有关的动态信息，特意整理出这个座谈会的发言，编印了这本发言纪要。

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

2007年6月



发言纪要

郭雅琦：今天这个会的主角，是来自各个地区的“同志”活动场所的经营者，我们今天主要是听取经营者的心声，听取他们在艾滋病干预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需求。所以，我们不设领导和专家的开场白了。这些经营者，就像童戈老师在很多场合说得那样，他们在中国同志群体生活健康的各个方面是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一个群体。他们冒着非常大的风险，包括经济风险，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财力，为同志人群的生活环境改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艾滋病到来的时候，一些场所的经营者们，又在艾滋病干预方面，积极参与。但是，场所经营者遇到的问题，目前还很少有人去关注。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在2003年做培训的时候，搜集了一些经营者的建议和意见，并及时放在了当时的培训中。今天呢，我们也是第一次做一个尝试性的工作，就是把一些经营者请来，专门地讨论一下自己的问题。今天，我们也请了各方面的一些专家来参加我们这个座谈会，主要的目的就是使各方面的人能够听到经营者的呼声。另外还有一些是列席的代表，我们都表示欢迎。另外，在这个会议中，南京中天娱乐宫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们在这儿也非常感谢他，请大家给他点儿掌声。国家CDC性病控制中心和曹宁校医生也给了我们大力支持，我们也给他来点掌声。

（掌声）

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和主角都是经营者，所以我们希望把更多的时间给这些经营者。

下面请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童戈先生来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童戈：非常高兴和新老朋友们有这个交流的机会。我们召开这个座谈会，刚才郭雅琦也说了，我在多种场合，包括在我的文章里强调，中国的同志人群，一手争取平等权利，一手抵御艾滋病危害，我们的活动场所经营者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社会非常沉闷压抑的环境中，是我们的经营者用自己的资金、自己的胆魄、自己的智慧为同志社区的形

成，群体意识的提高，娱乐等等，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今天，我们坐在一起，要讨论一下，我们为了抵制艾滋病的危害，大家为什么要参与，我们的需求是什么？这是我们这个座谈会的主题，就是倾听我们经营者朋友参与艾滋病干预的心声和需求……这块事情，以前没有人关注，或者说关注到了还没有做。那不论是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还是我童戈，我们想到了，我们就把他做起来。这是一个倾听大家心声的机会，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今天坐在这间屋子里的，都是在中国同志人群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上有着积极影响力的专家，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大家没有顾忌，不要说套话虚话，我们说点实实在在的话，集中上午的半天，我们把大家的心声倾听一下，下午我们把没有讲完的继续讲，我们大家还要有一个互动交流。……我童戈要完成的，就是我最后要拿出一个经营者参与艾滋病干预需求的报告，拿出一个简明的报告，这个报告尽量地能够影响到更重要的决策层，这是我的心愿和目的。

经营者（常州）：我先开个头吧。我做这个同志酒吧已经七年了，说实在的，真的是很难。当初开办的时候，世人的歧视眼光，人家不理解，包括公安方面，三天两头来，真的是三天两头。在那种情况下，我就是豁出去的。

我记得是哪一年，9月11号，我也豁出去，我主动跑到派出所去，我跟派出所所长坐下来谈了一个半小时，谈了很多很多东西，城市的发展，经济的手段，同志人群的事情，说实在的，同志人群的活动离不开这些因素的影响。酒吧开起来以后，同志就是慢慢汇集起来的，明的也好，暗的也好，都是慢慢浮出水面，大家在这里见到了许多同志，每个人内心的很多很多压力就释放了，精神状态就放松了。我当初跟派出所去说的时候，他说，“你这个人城府很深，资格很老，我说不过你。”我说：“你是说不过我，因为我有理。第一个，我开这个酒吧犯没犯法，第二个，同性恋犯没犯法。我们都是合法的。我也想着社会上的人孝敬孝敬你们，但是我没有钱，你说我犯法，你就拿出法律条例来，该怎么做怎么做。如果按照你公安的眼光和手段来处理同性恋的话，咱们这个城市，全国，就会天下大乱。”我说，我相信国家对同性恋问题慢慢会重视起来，因为这个人群的人数不少，（存在）范围很大，没有说谁能一手遮天，把同性恋这块遮掉。还有一个，我问他们说，在常州这一块，常州算不算改革开放，他说算，怎么不算改革开放。我说这可以，以前的事情，我们不谈，而在改革开放以



后，我们做同志的在慢慢得到了人权。以前谁敢给同性恋开酒吧？以前是搞地下工作都做不起来，据我了解，以前在常州有一个同性恋，判了八年，判了流氓罪。现在他六十几岁，我们都叫他前辈。我说我们哪一天要帮你树个碑，因为你经历的太艰苦太曲折了。所以说，我去谈了以后，他们就不再三天两头来。

说到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希望，那么现在呢，就是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像每个开酒吧的，说实话，压力很大，我们都承担着很多经营者的责任，比如说，在治安方面，我们做酒吧老板的，你说碰到坑蒙拐骗，敲诈勒索的，你要不要管？必须管，否则，你的生意就别做了。我跟公安也说了，我们为你们挑了很多担子，我们自己把许多要你们来做的事情已经处理掉了。

还有一个，就是艾滋病的问题。我们每次周末搞活动的时候，都会宣传“快乐不忘安全，做事不要忘记自己的生命”。现在，宣传预防艾滋病，对我们也不是一听就害怕的事情，我们也愿意用做预防艾滋病的事情，争取各方面对我们的正面印象。而同志人群呢，像他需要安全套了，他还是要依赖你，他从这里得到安全套，比他到外面市场上去买安全套，在心理上觉得安全。

从我内心来说，我们受了很多委屈，我们这么多的压力，我们跟谁说，没有一个代表我们说话的人。今天在这里发言，就是把我多年压抑在心里的话，今天可以公开的，大胆的可以说出来，一吐为快，我相信，经营一段时间的经营者的，同志场所经营者的，和我的感受都差不多。所以说，今天说我代表也是，同志圈内的也好，代表我个人也好，把我自己想要说的话，今天借这个平台，我就说这些。

郭雅琦：你觉得有什么需求，在你们工作当中，希望什么。

经营者（常州）：希望经过专家啊，还有官方部门啊，对我们经营场所经过考核、考察以后，给这个场所冠一个名，挂一个牌，比如“艾滋病干预基地”什么的，让他们搞宣传活动的时候，可以名正言顺的搞，不能说，我在这里搞活动，我还要跑到门口看公安有没有过来，他一过来，里面这么多人，他一进来，里面人什么心情，感觉绝对不一样。要考虑同志场所消费者的特殊性，其实他没什么事，但警察来转一圈，来消费的人，心情完全不一样。你给我这个“艾滋病干预基地”什么的，我把宣传预防艾滋病的活动结合进去，有这个牌子一挂，

有说服力的。

罗玫：如果你这个场所挂一个牌子，会不会影响你的客人。

经营者（常州）：不影响。

罗玫：会不会认为，凡是到这里来的，因为我这个牌子不是很普遍，人家会不会认为到你这里来的有问题。

经营者（常州）：不会。现在很多人关心艾滋病的问题，消费者也关心你这个场所的安全问题，我来安全不安全，我舒服不舒服，如果你这边很太平，我来就很开心，一切都OK。这个基本上没有大问题，主要是靠我们去跟他们沟通、宣传。

经营者（南京甲）：……在经营场所中，能有这个“健康干预”的牌子在那里，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做，我们再做宣传，做预防、干预，就不会造成尴尬。在同志经营场所中，有同行之间恶性竞争的现象，比如我们组织做活动，宣传出去了，来的人肯定很多，肯定影响别的场所的生意，但是别人不服气，电话打到警察那里，诬陷一个情况，警察来折腾一番，客人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他是来消费的呀。

经营者（苏州甲）：我在98年开始经营苏州的第一家酒吧，现在我经营的是第六家同志酒吧了。……可能很多朋友曾经在新浪或者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就是指责同志酒吧开到学校旁边，写的就是我的酒吧。

去年三月份的时候，这篇文章怎么出来的呢？我的酒吧开设在苏州的一个苏州中学的附近200米以外的一个地方，后来呢，我只能是估计，没有证据，有人恶意来举报，写了一封信，寄给报纸、苏州市长、副市长那边。当时是《江南时报》，就派了两名记者采访，当时是暗访，我还不知道，我是后来回忆起来，有两个女的过来暗访。整个篇幅就是写酒吧里面的情况，当时呢，她也没下结论，酒吧开在学校附近是可以还是不可以，这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论。后来这个文章上了新浪网站的头版头条，这篇文章出来以后，苏州市的副市长批示，学校附近不宜开这类酒吧。结果，公安工商文化联合执法，他们先后联合执法了三



次，每次来，都查不出什么东西，因为我那个酒吧楼上楼下没有一个包间，全部敞开式的，他们来检查的时候，我就说，你来看，我们是敞开式的，你说公开场合能做什么？如果是包间可能还能做小动作，但敞开式的能做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来检查，他们也说不出我哪里不行，我该办的工商、卫生，还有从业人员上岗证，我们全部齐全。后来他就说：“你生意太好了，不要红红火火，不要影响太大，我劝你早点关掉，你还是不要开了。”他说：“你不相信的话，我从明天开始，每天安排两个警察在酒吧门口检查客人的身份证，看你怎么开。”当时，我真的是焦头烂额。当时刚刚转让两个月，还没收回成本。苏州市副市长先后三次批示，都是不适合开这类酒吧，我当时也在想，同性恋酒吧开在学校附近，两百米以外，首先学校下课时间是五点半左右，我酒吧营业时间是八点半左右，这个中间相差很长时间，对不对？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苏州大学当时有一个教授，他发表观点他说同性恋酒吧开在学校附近，会影响学生的性取向。后来就有人反驳他，一个心理医生反驳他，他说全社会有这么多异性恋酒吧，怎么就没有改变同性恋的性取向呢？……

那么，后来这个事情是怎么解决的呢？可能这个不能上台面说的，通过很多的努力，花了很多的精力，花了很多很多钱，每个部门，每个人摆平。

当时，一个公安系统的负责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也是他的真心话，我当时听了以后，心里面感慨万千的。他说像我这个酒吧证照各方面，该办的东西，我全部规规矩矩，办得这么齐全，不容易。这就是说我在合法性上挑不出毛病。另外，我当时还拿出一个官方卫生机构在我们酒吧建立“艾滋病健康教育基地”的协议，我把这个协议给公安看。我说我们经营这个酒吧，是给这个人群提供这个活动场所，开展艾滋病防御工作，有这个合同，也有这个项目。他们看了半天后，负责人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不管这些东西。

童戈：我替他补充几句，他是在2003年开始接触纪安德在南京举办的培训活动以后，开始把苏州地区的同志志愿者工作搞起来，尽管现在他不是志愿者小组的，他的酒吧到今天，还在跟苏州CDC合作，今天还在搞着VCT，昨天今天明天，连着搞三天。

经营者（苏州）：对，昨天今天明天，三天，我们和苏州疾控中

心在我们酒吧里搞活动，动员VCT检测。……可能因为我是个佛教徒，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好，我觉得我是开酒吧，是合法的经营，我在酒吧里开展艾滋病防治的工作，我是行善，没有错。但是要解决问题，我这套道理没有用，还得靠钱。

有个道理，就是我们赚钱不赚钱，赚多少，赔多少，我们赖不上别人，这是我自己应该承担的风险，作为投资经营肯定有风险。但是，有多大的风险并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而是社会歧视给我们造成的。

还说挂牌的事，其实我觉得，给我们这个酒吧挂牌建立了艾滋病预防哨点，我们怎么做，公安怎么办，不应该由我们去告诉公安，而是应该由疾控中心，或者官方机构，由他们去协调。我们跟公安说一百句也没有用，他们不听的。你跟他们说有什么用呢？对吧？

我再说两个事，这个同志酒吧，周边的居民会说，你在开展艾滋病防御工作，你那里肯定有艾滋病感染者，为什么有感染者？因为你们是同性恋酒吧。他们把同性恋和艾滋病划等号，他不希望周边有艾滋病感染者，他怎么办？就无事生非的到处举报、写信。而我们的公安、领导，就被这些认识牵着鼻子走，怎么办？……我就说这些吧。

经营者（郑州甲）：……前不久，××报纸报道了我们这个酒吧，这个记者把路线、地址说的非常清楚，只是没有写明我们会所的名称。但那条街一共有五百米，只有我们这一家会所。那个记者说，有个人，四十多岁，被一个同性恋领到这个会所，从此以后就不管家里儿女了，性取向就变了（哄笑）。这个事情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有些媒体对同性恋特别无知，却又误导着大众。……河南的情况跟其它一些地方不一样，前不久，我们郑州公益先锋工作组搞了一个2006年的志愿者表彰大会，我们给各地的志愿者发奖状，有七家媒体来，我们也给媒体发了奖状。而且，我们制作了“防艾”志愿者的胸牌，我们把这个牌子给了艾滋病的科长，CDC的，给他的编号是“001”。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和CDC的合作也是不错的。

而派出所这块呢，不仅仅是派出所，现在环保、卫生、各方面，他都介入这一块，他觉得这一块是肥肉，他没事就来一趟，到你这儿找点毛病，让你给他塞点钱。

在2005年的时候，郑州有一个蓝梦酒吧，当时开的位置离派出所不远，大概有二百米左右。那个所长包括指导员在内，说什么同性恋酒吧国家都不承认，我也不承认。我说国家哪里不承认了？你不承认是你自



己的事。后来，我们工作组去找他谈了两小时，后来我们是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市政府的一个领导吧，他说，你必须在一个礼拜内关门。最后这个酒吧还是关门了，为什么关门呢？报社记者打电话诱导，要找小孩上门服务。当时接电话的是新来的吧员，他说，你来来看看吧。当时这个录音就是证据，然后这个酒吧就彻底地查封。当时那一天，一下子抓了80个人，后来老板拿钱把人赎回来以后，这个酒吧就关了。

有时候，公安也不是依法检查，就是威胁，把警车停在酒吧的一百米以外，同志看到有警车，特别害怕，不敢往酒吧去。现在，好多了，不怕警车了，敢大胆往里面去。

还有一个强行要求我们雇佣保安的问题。按经营场所的面积算，你有多少平方米，要你加两个保安，一个保安是1500块钱一个月。

经营者（上海）：你是经营单位我也是经营单位，你有什么权利强行收我们的钱？我如果需要保安了，我愿意用你了，我聘用你，我给你发工资。你凭什么强硬的叫我用你的人？所以说，你本身就是公司，你公司就是经营单位，你代表不了执法部门，你有执法的权利非让你来保护我吗？没有这个道理。

罗玫：这是不是针对所有娱乐场所的？

经营者（插话）：所有的娱乐场所，但是他有一条，你只要是给他钱，他可以不来。公安局下了红头文件。原来说你自己加强内部保安，你也可以请保安公司保安，也可以自己设立保安。但是，现在不是，整个强制性的。很多大酒店没有他们保安公司的人。但是，他一看你是同志活动场所的，就要给你强派。

经营者（插话）：公安局自己开的保安公司。公安局相当于政委这个角色的，就兼并保安公司的负责人。国家明确规定的，就是国家公务员不允许经营，但是保安公司是特殊行业啊。

经营者（插话）：每个酒吧的性质不一样，大小，还有酒吧的整体性质，有的像西餐厅，他可以不派的。

……

经营者（郑州甲）：洗浴这一块，和艾滋病的传播，尤其紧密。有的人进了浴池，可能一天玩不到八个人就不出来。我们工作组在这里直接设了一个健康咨询室。你不发安全套你不发，他就不用，有的，你发了他也不用。再有，浴池不像酒吧，浴池这种地方，一培训，本来是四十几个人，一会儿就剩二十几个人了。我们工作组就采取白天下午培训，晚上不培训。公安局也去查，查到我们的志愿者在那里发宣传资料，发安全套，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东西，是支持淫乱。我们说是预防艾滋病，他们说预防艾滋病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就是管制淫乱的，照样罚款。所以，我们志愿者也迫切需要有一块牌子，一个护身符。

童戈：我再介绍一下他，他是郑州的经营者。他现在是经营者的角色，其实，他是西安的工作一个早期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然后，他是河南郑州的公益先锋志愿者小组最早的发起人和领导人，现在好象退居二线了，有点做幕後黑手了。

经营者（郑州甲）：我们工作组做了不少工作，但是我们资金方面非常匮乏，每年我们就一万块钱，一万块钱用到哪里？就是办公经费、水电费，办公室的电脑还是我个人的，办公桌也是我个人的。我们社区里面的同志也非常好，有给我们赞助U盘的，有给我们赞助移动硬盘的，还有给我们赞助饮水机的，还有的给我们掂两桶油的，送点水的，……所以说，我们的支持比较缺乏。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没有安全套了，就断了。我每次到北京开会的时候，就背两箱子回去，到北京时，各个地方去要安全套，就像到你们艾协一样，我们就跟扫荡队一样，见什么抓什么。

罗玫：比如说，现在在安全套包装上印上，说是国家的什么项目，这些会不会对警察不再干涉你们有帮助。原来也听说，安全套上印了这些，人家不爱用，但是你要在酒吧、浴室，对公安来说会不会好一些。

经营者（郑州甲）：会好一些，他们就是觉得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是全社会的事情，是每一个人的事情，我们同志人群自己发动起来了，可是，光我们自己高喊预防艾滋病，你是政府的官员，你都不关心，我们凭什么关心啊？



经营者（郑州乙）：现在单凭CDC到派出所说是不行的，政府的某些部门怎么才能协调一下。各地政府如果协调一下，这样会更好。

经营者（南京乙）：他们戴着国徽都不关心这个事情，我们来关心。

经营者（郑州乙）：还有，像这些农民工，卖血的，他们中间就没有同性恋吗？他们中间就没有男男性行为吗一个人？

童戈：他们郑州志愿者小组做过一个非正式的调查，是很重要的信息，但是拿不出来一个正式的调查结果。有一个三十多人的卖血感染者群体，里面有几个人早就存在着男男性活动。他们到北京开会的时候，经过证实了，那个村子，大概有几千，最少有几十人早就发生过男男性关系，所以，我们同志人群也不单是我们相互感染，也受到了外部的感染。

经营者（郑州甲）：那个村有两千多人吧，是个“艾滋病村”。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问题，相互交叉感染，他们的感染者中，外出打工，找小姐玩了之后，又找同志，这种感染也是有的。

……

经营者（常州）：去年有一个新闻报道，是一个苏州的小男孩，他在哪里感染的艾滋病，自己也不知道，然后，他在常州火车站一直徘徊，后来给记者打了一个电话。这个采访一出来，给常州放了一个重磅炸弹。我是经营酒吧的，再说我在常州地区人口比较熟，天天白天黑夜都有人向我打听这个人是谁。他们想知道自己和这个男孩有没有过性关系。我对他们说，不管有没有关系，你自己去查一查就知道底细了。有一个艾滋病，就等于在同志圈子里面放了一颗炸弹，影响蛮大的。

经营者（合肥甲）：……在我们那边，和大家一样，一开始刚开业的时候，也需要花钱摆平很多东西，不过，因为我的酒吧面积比较小，不是很大，麻烦还小些。我们还有一家比较大的××酒吧，以前就是经营“同志吧”，我们这次接手重新再做。开业的时候，那天请了很多人，也请了CDC的人。

可能是有人恶意举报，那天晚上，警察来了，而且拿了摄像机拍

摄，不是拍我们的演出节目，而是到化妆间去拍演员。因为演员需要换服装什么的，我就直接阻拦，结果，我就被直接抓到派出所去了。第二天，我们拿了两千块钱，还找了其他社会关系比较硬的朋友请吃饭，摆平这件事。

在安徽，还有一个同志自己组织的江南同心志愿者小组，他们也跟当地的CDC联系。但是这些工作组对酒吧啊、浴室啊，关注的少一点。对酒吧这块儿，就是你有聚会他就来送一些东西，其它的支持相当少，包括VCT检测什么的，都是我们主动跟他们讲，我们这有些朋友需要检测。所以，CDC对于酒吧这一块应该加强关注。……大家在这种环境中唱歌跳舞交流啊，然后彼此相识，在这个玩的过程中可以传达很多预防艾滋病的信息，包括一些宣传，都可以利用起来这个平台。我们愿意做这些工作，我们做这些工作，对我们没有什么损失啊。但是，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有实力能够压得住公安，也能让大家从心里面感觉比较认可的牌子，否则，我们做艾滋病的事情，反而好象我们有病，我们在作秀。

经营者（苏州甲）：我自己本身在经营酒吧，同时我也是我们苏州志愿者工作组的成员，经营酒吧和这个工作组，志愿者相互结合的话，相对来说，工作开展得会比较顺利一点。

我们在酒吧里面开展预防性病艾滋病工作，一个是在我们酒吧里面，有专门的宣传版面，宣传VCT，宣传免费检测，进行转介。还有，我们会把安全套，或者是润滑剂，作为在酒吧组织大家游戏的小礼品、小奖品。比如说，我们开展一些比赛，或者是小游戏，就用安全套和润滑剂作为奖品和礼品，用这种方式宣传安全性行为。还有，我们酒吧配合CDC，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印的倡议书，和苏州疾控中心合作的倡议书，这是我们这次搞的“相约健康社区行”活动，我们志愿者工作组，在酒吧，还有在浴室，和疾控中心配合，我们搞了从2007年5月份到12月份的一系列预防艾滋病活动，我们先做一次定点定期的VCT检测，酒吧和浴室就是VCT检测基地。我们同时组织参加检测的人做一次同伴教育培训。到12月份的时候，我们再做一次检测，做一个对比，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我们酒吧里面，每个桌子上会放一张倡议书，有些客人感兴趣会看一下，知道哪里有检测。比如说今天，5月12号就在他们（指参会的另一位苏州的经营者）浴场里检测，有些客人在浴室酒吧里不好意思检测，我们13号，明天，就在宾馆里面设一个房间检测，这样可以消除他们的顾虑。反正我觉得，在酒



吧里面，我们积极参与的话，对于干预艾滋病防止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觉得在酒吧里做防止艾滋病工作，有一个要考虑，我们不能过度宣传，客人兴致很好，很开心，你上去说，同志艾滋病感染率很高，一下子大家就没兴趣了。我们把宣传材料就放在桌子上，大家有兴趣就看看。我们在一些节目中加进宣传预防艾滋病的内容。因为我们酒吧是以盈利为目的，我们不能影响我们的经营。

经营者（杭州）：我是杭州某酒吧和某浴室的经营参与者，管理者，同时也是浙江爱心工作组的一个志愿者。我们刚开始的情况和大家一样，就是派出所经常来干扰。后来，市疾控中心帮我们出面跟派出所协调，讲预防艾滋病的道理。如果把所有的同志活动场所都关了，都封闭了，大家不是还要各处“打野战”去吗？酒吧这样的场所，是一个同志集中活动的地方，是同志人群的活动平台，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地方搞宣传。后来市公安局就默认了。所以，我们周末也会不时地组织一些活动，宣传一下预防艾滋病。而且，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我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个工作也是从零开始的，原来就在很小的一间化妆室里搞了一个艾滋病自愿检测，当时很多人不敢也不愿意参加，后来经过宣传以后，很多人愿意接受检测。现在，我们这个场所已经撤掉了，他们有需要，我们会介绍他们到市疾控中心自己去检测。疾控中心对我们也很支持，安全套只要我们去拿，他就会给我们。我们的酒吧在西湖边，周围都是酒吧，也不存在居民的干预，在杭州，他们对我们酒吧处理的比较妥当。

经营者（芜湖）：我们芜湖是个很小的地方，跟大城市没办法比，但是我们酒吧也做了快四年了。我们酒吧和芜湖疾控中心也有合作，每个月有一到两次，会有组织和进行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活动，我们也以酒吧的名义向大家提供一些赠品，我们也到一些地方，比如到户外活动的地方去发一些宣传单，另外，也组织进行艾滋病的检测。我们大概已经做了一两年这方面的工作。基本上，我觉得在芜湖这个城市的社会面上来说，疾控中心还是蛮支持的，特别是公安这一块，疾控中心出面做他们的说服工作，公安也支持我们做这方面的事情，他们也会考虑的，酒吧的活动，是同志人群可以控制，可以交流，可以组织的一个场所，一个活动平台，而那些户外的公厕、公园，都是放任自流的，神仙也控制不住。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

经营者（扬州）：我做了七年。刚开的时候有阻力，关键是公安的治安大队。后来，我和他们的关系搞得好些了，他们就建议我，你不要搞活动，你搞活动抢了别人的生意，他们找个理由一打110，警察肯定要出警。当时他们到我这里来，我跟他们讲，你们执行公务来检查我欢迎，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们不要把客人赶走，我们是先消费、后买单，如果你们把他们赶跑了，你们要赔偿我们的损失，我们是合法经营。我们这个场所作为一个同志人群的交流平台，如果没有这个场所，大家就都去了室外，我们开这个场所，就是给大家提供这个方便。派出所后来也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小，第二个，大家互相都认识，有人际关系的优越性，如果是外地人来开，肯定开不下去。

还有我们每次搞活动，不是这方面的人，或者这方面的人，看见我们有什么钢管秀的跳舞等等，就打110报警。GAY吧的生意好不好，和这个地方的人，我说的是“同志”，他们是不是开放有密切的关系。我敢说南京生意好，苏州生意好，扬州的生意最差，比如说扬州现在，“同志”的心态就不太好，有的人，很有身份的人，宁可去公厕，也不敢到酒吧来，怕检查。所以，我开了半公开的会所，有的老板，比如说，市政府的官员，他到酒吧来，肯定有失身份，他就可以到会所去，一样消费，一样有酒喝。

我开了几年GAY吧了，媒体给我曝了四次光。我们酒吧正好开在老城区灯光很昏暗的小巷子里，媒体就这样说，那样说，媒体很讨厌，不讲道理，不讲法制，法律也没规定酒吧必须开在灯火辉煌的地方啊，小巷子里灯光昏暗，那是政府不肯改造路灯设施啊，关我们什么事？我们的招牌就在上面，我们合法经营，媒体怎么不说这些？

我们也和扬州的CDC配合，动员大家体检，发放安全套，宣传艾滋病，原来我们还说是避孕套，后来才改成说安全套，我们做什么都是很加小心的，不愿意给社会找麻烦，也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积极参与，并且组织起来，在扬州来说，基本上出来玩的人，都知道我，我开了七年的GAY吧，没有什么问题，不亏本，我是一个老GAY，我愿意勤勤恳恳的为大家服务，大家方便，我就有饭吃。

经营者（蚌埠）：像我们那边的酒吧，开业的时候，公安局派出所也来过，来了，给完钱以后不来了，隔段时间，不给钱了，他也天天弄辆警车，离你大概一百多米，也不找你，就从晚九点多开始，警灯



不停的在那里闪闪闪，没完没了，连续半个多月，酒吧只好倒闭。

司马杰：你们在开展活动的时候，是跟CDC一起去公安局，给他们通知，还是说，你是在开展项目的时候，公安机关会过来向你询问这个项目？

经营者（扬州）：我们搞活动，无需跟公安讲，他们来查，我们说明一下就可以了。我希望能出台一个证书，或者一个委托给我们，在公安来检查时，我们可以把材料拿给他们看，不要让我们象打游击战一样的搞活动。

经营者（苏州乙）：我们搞活动是这样的，对同志这个圈子里的人，由我们来召集组织，至于公安这一块，由他们CDC去打招呼，如果是大型活动，他们会打招呼。事实上，CDC是不是真正去协调了，这是关键。

……

经营者（南京丙）：刚刚看到这个会议主题，“经营者的参与和需求”。我觉得，每个经营者都愿意参与到艾滋病干预中去，这样的会议，我们愿意参加，我们对艾滋病的了解，通过不断学习，会从小学生变成一个中学生，也许变成大学教授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对掌握了一些预防艾滋病的知识以后，我们怎么去宣传？就凭着我们这帮经营者也好，一小部分圈子里的人也好，就是一个一个人的靠着我们的嘴巴去说吗？范围太小，宣传力度也不够大。我说，我想到酒吧里搞这个活动，其实，有些东西呢，客人到我们酒吧是来消费啊，我们跟他宣传这些东西，我们拿什么合适的东西给人家看？有什么合适的手段，我不能是给客人上课吧？……志愿者他们有什么宣传册，但只是他们做工作时才能看见，他们也不是总到酒吧来。我们没有那些宣传材料，我们只能是今天跟你说，明天跟他说，……

童戈：我觉得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的一个地区，也在表面上有了一个同志志愿者的组织以后，这些志愿者组织是否真正的能够和我们经营者形成朋友，能不能够走近人群当中去，这是一个问题。

经营者（成都酒吧）：我们成都应该说在全国搞的比较早，其实，我们开始时，和大家遭遇的情况也差不多，也被什么公安来查处。后来，随着中英项目开展艾滋病预防工作，大环境变好了，现在像成都的志愿者小组影响也很大。所以，现在公安几乎不来干涉我们了。

……现在来说，我觉得应该加强宣传力度，不仅是预防艾滋病，还有同志的自我认同问题。因为，实际上现在还有很多“同志”没出来，不敢参加集体活动，敢出来玩的真是少数，他们还是偷偷摸摸的活动，艾滋病预防的知识就传达不到他们当中去，他们在这方面的意识就比较淡薄。

成都同心工作组、同心咨询中心负责人：刚才童老师讲的那点，非常关键。因为我是做社区组织的，志愿者组织的，我就想，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们是需要和酒吧合作的，而酒吧的经营者也需要社区工作者为酒吧做一些工作，他们需要协调一些关系，比如，他们和疾控中心的关系，和其它政府部门的关系，和媒体的关系，他们有这样的需求，那我们社区组织就应该帮他们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会请一些和我们形成了很好的交流，对“同志”问题形成了很好的认识的媒体人士到酒吧去参观，去看演出，甚至，我们还请到一些像四川省委党校的人，省委宣传部长什么的，在搞培训班的时候，请他们到酒吧去看看。这也是童老师讲过的吧，做“同志”的工作，就要尊重“同志”的亚文化吧。实际上，同志酒吧的客人，有的时候，除了我们同志，除了我们自己的同志文化，自己来玩，生活中要玩耍交流以外，很大程度说，我们的酒吧，也有一些非同志的来玩，看一下。这样，同志酒吧对外界也是一个窗口作用，展现同志人群的一个客观的生活面。……我们会邀请很多人到酒吧来参观，这样会促进整个大环境的进步。

所以社区组织可以给酒吧提供很多的服务，比如说他们需要安全套，需要什么东西，那么社区组织可以在这方面可以帮他们做更多的协调的工作。

因为平时我们很多人觉得同志人群的社区组织，他们觉得你是他的娘家，但是他们会说你是领导，我们都说我们不是领导，我们只是这个人群的服务者，所以你需要给所有的酒吧，就是目前已经和你合作的，以及还没有跟你合作的，你都要给人家提供一些帮助。我觉得这是同志社区工作者的一个基本的定位，一个基本的义务，否则，就不要做社区的



工作了。我就简单补充这一点。

童戈：社区组织必须和经营者交流，成为很好的朋友。这样的社区组织才叫社区组织。我们的专业机构，NGO，专家，都要倡导这一点，都不要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价志愿者的资格，去给志愿者加封“正宗”、“老大”这一类的东西。

经营者（南京乙）：我觉得，咱们的（预防艾滋病）工作，最主要的就是不能光局限于咱们的那些（志愿者）组织，我们经营者搞这个活动，要我自己掏钱，有什么单位能给我们一些实实在在的支持。另外一个我们经营者的老板首先他也在学习，他不是志愿者，但是他先学会了如何去防艾，他才能开门让志愿者进来工作，才能支持志愿者的工作，这个工作是联动的，不能说是志愿者必定比我们高一等。……我希望咱们各个地方的酒吧浴池老板能有一个好的网络平台，比如说私下交流的平台。我接到很多电话，比如说你们酒吧在哪？浴室在哪？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平台出来，外地到苏州来的，到杭州去的，到任何地方去的，全国各地的同志出差开会啊，他就非常轻松地找到这个场所，我们就很容易交流。大家联手做些防艾的工作，比如，到我们这些场所，让他觉得我们普遍在宣传安全套，而不是到了这里有宣传，到了别处没有宣传，反而显得谁宣传谁在出风头，谁在作秀，……

郭雅琦：……全国有很多的“同志热线”，他们有很多咨询的需要，我们经营者能不能主动地和他们联系，把你们的信息告诉那些愿意帮你宣传的热线。当有人想去哪，就能够得到信息。现在我们酒吧也好，浴池也好，变化太大，有时候，我们给人家提供了原来的信息，却让人家白走路，没有找到。所以，不仅仅是你自己宣传，你还要更多地利用这些渠道。反正我们很多热线提供这些信息。当然有些热线不提供，你可以告诉他。我想大部分会提供。所以你应该主动一点去宣传自己。比如说，我从北京，有人想去扬州、南京，都来给我们打电话，你知不知道地方，我们确实提供不出来，我们从网上找也找不到，找到也是过时的信息，电话不通，给我们也造成很多的影响。越小的地方，信息越珍贵。

经营者（郑州乙）：我刚才就想到了这一点，不算建议，应该说是

一个希望。我以前也参加过很多会议，我觉得这次是第一次是这么多的经营者坐到一起，我们考虑我们的需求，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成立一个类似于行业协会的组织，来协调各地、各个酒吧、浴池的一些共同的利益，包括艾滋病预防工作的推动啊，一些法律咨询啊，比如说警察的干扰，他可能是违法的，但是我们没有人敢出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就可以代表我们这些场所，有什么事情，以组织的名义，出面来替我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我只是有这点希望，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成立一个类似于行业协会、酒吧协会之类的组织，也可能是个信息中心，相互联系沟通一些信息，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做一些协调和服务的工作。

经营者（郑州甲）：这样的协调机构应该是不错的。比如说，协调价格竞争，再有的酒吧为了个人的目的，看到别人的生意好，打个110，恶意报警，这些都出现过，打价格战自相残杀。……

经营者（郑州乙）：最后吃亏的还是所有的场所，需要有这样一个组织来协调。

志愿者（镇江）：我们一直比较关注中小城市“同志工作”的健康发展。我觉得中小城市跟省会城市有非常大的不同，主要的特点是人员流动特别大，我说的是顾客群。酒吧里面永远有新鲜的面孔，新鲜的面孔对同志酒吧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非常乐意到酒吧去玩，去消费，他们总能看到新鲜的面孔。在中小城市，他经营的困难，就是缺乏“防艾”的组织和资源支持。可能镇江、扬州、芜湖，都遇到了这个问题。那怎么办？我觉得需要各方面，包括我们同志组织的支持和投入，哪怕是小恩小惠呢，给大家一些免费的安全套什么的，他心里就觉得受到了支持，有一些收获，在艾滋病干预工作上，对愿意做这个工作的一视同仁，资源共享，这方面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不是搞经营的，所以说我讲不出经营的内容。

童戈：那你作为志愿者，也是愿意跟经营者做朋友的志愿者。

志愿者（镇江）：对，中小城市的经营者，比省会城市的经营者困难更多。中小城市的志愿者也是这样，得不到支持，怎么平衡、持续



的发展下去，这是一个问题。

经营者（郑州甲）：中小城市的场所，去的人也不少。河南也是一样。

经营者（南京丁）：酒吧的事情说不少了，我来为浴池代言一把。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谈到艾滋病干预的参与和需求，有很多话。比如说对政策的需求，比如说对项目的连贯性、计划性的需求，很多。

我说的话可能不中听，却是实际情况。现在，艾滋病干预，这个项目组来了，需要数据，我们配合了，这个走了，下一个又来了，还是需要数据，干什么呢？除了检测就是检测，除了抽血就是抽血，这个机构这样做，那个机构还是这样做，反复的重复。……我们动员大家抽血是很费心思的，我说我查一下你有没有艾滋病，有没有梅毒，人家也很避讳的。但是，现在变成他想来抽血就来抽血，我们这儿好象给他们预备了自来水。

我们浴场开了一年多，主要的顾客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中老年朋友多一点，还有一个消费层面的问题，很多老年人、中年人，他不希望自己有抽血的尴尬，他说我年龄大了，我无所谓。所以我们的动员很费劲。可是，项目组来了，我们配合了，配合完了，就没消息了，跟着下一个又来了，什么时候是个了结啊。……我们很关心自己的健康，对不对，但你们要有统一的安排，统一的计划，不能老是不同的单位，不同的专家，大大小小的专家，大大小小的单位，这么轮流来，都要我们配合。可是，对我们的配合，好象我们是应该应当的，好象我们多么依赖着你们，利用完我们，什么后续的支持也没有了，这个情况让我们对你们很寒心啊，这是一个问题。

再有，我们需要政策的帮助。童老师你从北京过来，你向政府呼吁也好，怎么也好，在政策上，在形势上，究竟有没有大的起色？比如，2005年开会谈过的问题，到了2007年，只听见雷声，见不到下雨。你们也要考虑考虑，我们一旦剥光了站在社会群体面前，得不到政策的、法律的保护，受伤害的是谁？是我们，……包括艾滋病干预，需求有没有？很多，包括经营场所的，浴场的这种交流，成都怎么做的，北京怎么做的，互相交流，需要一个平台。谁来做呢？大家自己做，需要这样一个协会式的东西出来，一直企盼着，也没有见着。对不对？那么浴场，他的艾滋病干预问题，除了给一点安全套，润滑剂，还有什么

支持呢？什么都没有了。……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经营者怎么需求，而是最后受益的同志人群的需求是什么？这才是我们的需求。他们需要防御艾滋病，需要这些东西的支持，需要怎么协调，

需要精神的放松，那么就需要社会的认可。所以这个问题就比较大。可是我们的指望在哪？

经营者（芜湖）：我说一下，芜湖比较小，但是因为芜湖城市比较小，所以有些问题在小范围比较容易解决，所以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也挺愉快的。

但是在艾滋病干预这一块，时间长了之后，从经营者的角度来感受，有点反感，因为我觉得无论谁来，都是来抽血的，多少人来抽，抽的少觉得不好意思了，抽完以后，送套，送KY，甚至送酒水单，包酒水费，但是我觉得干预已经很难接触到一些三十岁以上的人，我们一般活动，满屋子都是小孩，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做的时间长了以后，来检查的总是这么一帮人，而不重视的，不接受的，他始终不接受，对于做检测，还是有抵触。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干预活动，抽血的事情实在是太频繁了，没完没了，谁来做都是这一套。

如果能够给我们支持，定期的以联欢、节目的形式，半年一次，因为在小城市，特别是县市，我们认识很多人，集中性的聚会，搞联欢的形式，大范围的宣传，效果会更好。

（大家都反映这类问题。）

经营者（南京）：……那么相对来说，中国的政策，从某个方面来看，人们已经认可这个群体的存在了，已经好象不太敏感了，政府不太管了。这是我们比较欣慰了，我们不是特别像作贼了。需求太多了。

经营者（南京丁）：细说就是政府对“同志”问题究竟怎么看，究竟怎么办？童老师，你们在上层的一定要有更多的信息反馈，对不对？我们需要了解上层有什么新的动向、动作。另外，就是上层对这个艾滋病干预，一定要求下面有计划性，有连贯性，让我们知道该怎么配合。否则，配合得越多，我们在人群中的信誉伤害越大，我们自己也越来越寒心。

……



司马杰：问一下，有没有关于政府能够帮助什么的一些具体意见。

经营者（南京甲）：那么我来讲一下，这么多朋友都发言说这个问题。

我觉得，对于我们经营者来说，最大的要求是政策的协调。比如说，成都的工作因为有政府的支持，艾滋病干预项目是政府签的，所以，他们能够把省公安厅的带到酒吧去，把文化局的带过去，省人大的官员都能够走进酒吧。这样，社会的方方面面，就减少了对我们的歧视和干扰。

第二个，就是刚才讲的，我们非常需要信息的交流，网站啊，热线啊，能不能成立一个经营场所联谊会的形式，定期交流一些东西，大家有什么信息需要互动。在互动中加强协调，也能学习别人的经验。比如说同志网站，包括志愿者小组啊，你需要参与的活动，你就参与一下，互相支持。不要各个组织划一块地皮，占山为王。

第三个，就是刚才大家说的，这是蛮重要的问题，不管是什么专家、机构来找我们，帮他们做过以后，有头无尾，雷声大的很，但是打过雷以后，他们把这个事情不管不问了，他们的报告数据出来了，我们呢？他们把这个善后的责任推给我们经营者了。我们动员人家去检测了，人家就找我们要结果，我们怎么办？结果，我们失信于大家。

同志志愿者小组也好，什么CDC也好，什么专家也好，他们的素质也要提高。你光叫同志人群提高素质，你们做这些工作的人，素质不提高，让我们怎么去配合？真的，有时候我们蛮为难的，我们也希望去配合大家做这个工作。对于我们经营者来说，谁来做我们都愿意配合，可是，你们各个专家，各个机构之间相互闹矛盾，你们把我们的配合也卷进你们的矛盾里面去了，你们利用了我们，还拿我们扯是非，同志人群的志愿者小组这样，官方的各个机构也这样，有的专家也这样，我们支持了你们，却莫名其妙的还得罪了你们，你们扯矛盾，拉是非，可让我们怎么做人呢？

经营者（南京丁）：你做完了，任务完成了，写论文，评职称去了，可是，我们还要面对这个群体啊，你什么话没有，走了，下次又来了，再做，第三次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影响是什么？所以哪个去做？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挫伤经营者的积极性，你们经常打击我们的积极性，导致我们就不愿意配合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在五一

的时候，和十一长假，我请CDC给MD做个培训，让他们做自我保护。我是积极主动提出来的，我们有这个意识，要求你们来，给我们做，我们请你们来做，你们不来，志愿者也不来，我们怎么开展工作。

志愿者（镇江）：可他们都在宣扬自己的“政绩”，一年两千多万，花到哪里去了，争“政绩”，争领导权，……

经营者（南京甲）：大力的宣传，怎么宣传都不过分，比如在12月1号国际艾滋病口搞活动。我亲自经历了一些事情，就是同样的工作，你们各个机构、组织、专家之间不要互相排斥。……你们之间互相诋毁，你们有话语权，我们没有话语权，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怎么办？……其实一句话，上层好说，基层不好说，阎王好敬，小鬼难缠。希望上层的一些东西，你们主持正义的专家能替我们去沟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经营者（南京丁）：现在进入了网络时代，你们专家也好，志愿者也好，可以搞一些适合大家需要，吸引大家兴趣的宣传短片，有意思的光碟，我们可以在浴场里面播放，这也是一个宣传的渠道。

志愿者（天津）：各地的情况确实不一样。我很羡慕那些摊上了做实事的CDC地方的志愿者和经营者。我说的，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在天津发生过的浴池事件。

在去年8月29号，有40几位警察，十几辆警车，突然之间把某浴池封了，在场的服务人员、在里面已经洗浴的顾客，围上一个毛巾被，包括一个进门买门票还没有脱衣服的人，全部带走。警察发现了地上有使用过的安全套，这个安全套离谁近，就强行让谁拿上，谁不拿就一拳打过去，而谁拿了就成了谁的罪证。包括我们在现场放的防艾宣传箱，里面的宣传材料，免费发放的安全套，都作为证据没收了。

当时去的警察，是天津市公安局防暴队和天津市河北区分局刑侦队两个部门的，当场带走的是45个人。他们把这些人全都带到河北分局的刑侦队，关在一个大房子里，要求愿意交两千块钱罚款的坐这边，不愿意交钱的坐那边，谁交钱谁可以走人。最终很多人都交了罚款，外地人交了罚款赶快离开了这个城市，本地同志，尤其是有工作单位的人，怕警察通报工作单位，也赶快交了罚款。警察同时也把老板拘留了，罚款10



万块钱。老板娘在和公安部门进行还价，最终还到了5万。在他交了5万块钱以后，警察把处罚通知单改了，前面说的是组织卖淫，交了罚款以后改成容留卖淫。警察对不交钱的挨个审问，凡是承认在浴室曾经有过性行为的，都被拘留了，当时拘留了八个人，以卖淫的罪名劳动教养了两个人。这个事情发生过后，浴池就彻底关门了，最后导致这个事情没有一个人敢公开作证。律师取证悄悄来说了，说完以后不敢公开站出来。

这里产生的问题，就是说我做为一个防艾志愿者，我们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我们跟CDC联系，希望CDC为我们要回宣传箱，CDC负责人却要我个人去公安局，去市政府上访，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怎么去上访，难道我去自投罗网吗？然后，他又让我去找天津市防治艾滋病协调办公室上访，我想，谁花得起上访的工夫，自己认倒霉吧。

还有一个，就是VCT检测，刚才有很多朋友谈到了这个检测，在天津的情况也是这样。VCT检测目前只有检测，只有抽血要数据，其它的后续支持，什么也没有。事实上，这是在消耗着经营场所和我们志愿者的人力资源，以及我们在人群中的诚信。

我提出一个自己的思考，刚刚很多朋友提到了，在一些经营场所挂防艾基地的牌匾。我觉得应该由卫生部门牵头组织，由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比如由组织了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委员会的六部委联合来发，尤其要有公安部门和新闻部门。现在，新闻媒体对同志人群的防艾工作，也是有歧视的。六部委联合发这个防艾基地的牌子，卫生部门和各地的防艾协调办公室可以去做。再有一个，我认为各位专家和领导是否可以呼吁一下，比如说在各地党校对当地的党政领导进行防艾政策培训，是否专家呼吁一下，可以对公安系统和司法系统的公务人员进行一些防艾政策的培训。这个只能靠专家们来呼吁了。

（上午发言结束）

郭雅琦：上午更多的是请各位介绍了各自的情况，下午就继续讨论，然后，我们看时间，争取早点结束。今天是周末，把大家请来开会，太不人性化了。

另外今天我们在场的也有一些专家，像罗主任和荣老师都是很早期就介入到这个工作的专家，所以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和他们有一些沟通。

经营者（南京丙）：这次开会，我们感触很深。为什么我们南京的许多老板都没有到。有一种感觉，就是专家来开会，项目组来开会，我们都很配合，用我们的资源，用我们的人力，没问题，用。只要是为我们这个同志圈子，我们就愿意提供。可是几年下来以后，会议开了不少，见的就是这几个专家。如果哪天再开会，他说，哎，我们区领导来了，或者公安局派人来了。包括上次在省疾控中心开会，也没出现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人，更不用说领导了。所以，我觉得做艾滋病的事情总在这个圈子里原地打转，没有突破。究竟控制艾滋病的事情只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还是政府的事情，领导的事情？我就搞不明白了。什么时候再开会的时候，真正做到公安代表出现了，或者市区的领导出现了，那么，我们才会觉得党认可我们，政府认可我们，而不是我们在底下私下努力。

我上次和童老师谈话，他介绍了一个“同志消费”概念，这个给我还是蛮新的一个概念。咱们就是经营同志经济这个体系的事情，我们怎么更好地联系、协调，平台也好，信息也好，这个，也请专家帮助我们多考虑考虑。我们在经营场所的时候，都是从零到有，都是自己在折腾，没有一个很好的专家组的帮助。所以，我希望，专家们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咱们现在做性病艾滋病干预，没有拉拉。拉拉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她们也是需要关注的。我刚才问了北京的，北京的“拉拉吧”也很火，北京干的比我们好，他们怎么做的，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同行之间互相的交流也很重要。我们从2003年开会就在讲这个事情，有一定的成绩，但是还有很多的不足。

经营者（上海）：同性经济很重要，怎么发展呢？还是需要各方面的探讨和支持。都说亏钱，开同性酒吧亏钱了，可他依然活着，有一大部分程度是因为我们是同志，我们需要这个平台需要这个角色的定位、认可。我们才开这个。但是不是亏得一塌糊涂，也未必，活活死死，我们依然在活。

经营者（南京乙）：确实，这个工作，几年下来，还停留在原有水平。从2003年开始，我接触到这方面的活动，到现在为止，南京的同志工作组的工作，就是发点安全套，发点宣传材料。到现在，也没



见搞点大的培训，没有大的活动。而且，我搞春游、我搞秋游，都是我出钱，邀请他们跟我来参加。但是，我们的积极性总被打击，因为我们经营酒吧，是盈利的，他们就不承认我们可以做志愿者。我不知道他们这个说法对不对。

经营者（苏州甲）：从2003年，我当时还没做现在的酒吧，我也是在参加了郭雅琦他们在南京组织的参与式培训以后，我们几个好朋友组织了一个志愿者工作组。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资金支持，就是靠我们自发的做，后来，包括艾协给了一些项目，我们慢慢做起来。那么我们考虑这个工作组能不能做得大一点，我们就开始做酒吧，把这个酒吧作为一个基地，同时，我们自己赚钱能养活自己，再维持这个工作。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方式。我们志愿者工作组不是靠哪方面给我们花钱，我们自己养活自己，一方面酒吧盈利，能够来推动工作组的工作，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遇到一个很郁闷的事情，也就是我们有关机构吧，直接说就是省疾控（CDC），他就觉得，你们现在是在开酒吧，你们是一个经营者，是为了达到经济效益目的，所以你们不能做志愿者，你们不算是志愿者。

我就不明白，难道我必须要把酒吧关掉，才可以做志愿者吗？我很心寒。我们为了这个做工作，反过来，他们说我们是为了赚钱，唯利是图。我就问，做“防艾”志愿者到底是什么标准？有什么要求？难道，我是酒吧经营者就不能做志愿者吗？

经营者（南京甲）：而且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在全国有没有普遍性，反正，南京的情况是这样，从2003年，他们志愿者小组要搞项目了，需要找人参加活动了，动员检测了，就来找我了，不搞活动的时候，就不认我。同志自己的志愿者组织也是这样。

经营者（苏州甲）：为什么说越做越心寒呢，我们省里面有关部门，他就觉得，他支持的志愿者就是不经营同志方面工作的，不开酒吧的，不开浴室的。

志愿者（郑州）：他们是偏激的，那说做环保的志愿者，你就不能开环保产品的工厂吗？你们这里的志愿者概念和我们的不一样，我们的概念是，你是经营场所的经营者，我们反而希望你来做志愿者，因为你愿

意做这个工作，活动场所的大门就为“防艾”工作打开了绿色通道。

志愿者（杭州）：我觉得不吸收经营者作为志愿者也有道理。因为志愿者搞活动会给酒吧产生效益。我们那边，浴室的经营者和酒吧会互相问，志愿者不在他那里搞活动，因为会给他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如果我是开酒吧的，我又是志愿者，肯定在我这儿搞活动，那我的效益就上去了。

志愿者（郑州）：你这个概念是错的，志愿者又不是同志群体的领导者，谁给规定了这么多的条条框框。那你不经营同志场所，你可以经营公司，你不也是经营吗？

比如，我们阿杰就不是我们志愿者组织的成员，但是阿杰属于独立的志愿者，报纸大篇幅的报道阿杰怎么做防艾工作。我们也定期到他那里搞活动，我们到场所搞活动是定期定点安排，只要是愿意支持我们开展工作的，我们都欢迎。

你们的概念可能是想着，这个志愿者都是有钱的，都是带着钱去搞活动。……

志愿者（镇江）：我想继续他们的话题，就是说，关于志愿者组织的工作和资源的问题，我深有感触，就是所有的支持资源都倾斜给了省会城市，但是省会城市的志愿者组织这些年有没有进步，他们的工作有没有往周边地区扩展呢？他们有没有覆盖更多地区同志群体的能力呢？这些，到底应该由谁来考虑？谁来考核？还是谁欣赏他们谁说了算？

当时，是2003年，南京的志愿者工作搞起来了，旁边的城市，镇江、扬州、无锡、苏州，还有徐州，大家都很着急，怎么办？刚好扬州，还有徐州几个朋友，我们说自己干吧。罗老师也知道，当时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我们一起拉着手，在非省会城市在做。那么，作为省会城市的志愿者组织，和我们中小城市的志愿者，说真话，获得支持的差别非常非常大，而且，也助长着同志志愿者组织之间种种不平等的待遇，不平等的意识。

经营者（无锡）：我插一句，比如说南京，据我了解，第一，工作组给场所的安全套很少，他们不搞活动就看不到免费发的安全套。第二，现在常州、无锡什么地方的，都没有安全套。我们要主动去跟各



方面联系，要安全套。我又不是工作组的人，我又不是志愿者，我在做的工作超过他们。

……

罗玫：我听大家谈的，应该说，我学了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很多平时不会知道的东西。我特别感谢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座谈会。我不知道别人，就是这种经营者的座谈会以前有没有办过，作为我来说，我是第一次参加。我觉得听到很多非常新的东西。

首先，我们应该毫无疑问的肯定，我们的经营者都愿意做这个工作，起码我们都已经在做“防艾”的工作了。还有，我们经营者都谈到了，我们的经营场所是一个很重要的防艾阵地。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阵地充分利用起来，把同志人群推到社会上，更加危险。

我们确实碰到很多困难。刚才，大家在讨论志愿者和经营者的关系，或者说是性质的区别问题。我个人感觉，这方面的专家也在座，这个问题其实并不矛盾，两者不应该有区别，不应该被区别对待。我觉得，这里头应该允许我们的疾控中心，我们的国家、社会有一个认识过程。应该说，志愿者、志愿者组织，这个概念内涵着什么？在中国并不是很熟悉，否则，为什么要那么多的专家，那么多的机构来研究NGO（非政府组织）的问题。

谁知道到底什么样才是志愿者？很多人认为志愿者就是吃空气的，就是什么都不要，任何报酬都不要的。其实，我们吸收国际上的志愿者工作经验，就知道志愿者的组织等等工作，和我们的想象不一样。但是，志愿者工作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我觉得，不盈利不等于说经营者就不可以做志愿者。结合几位朋友讲的，其实，做经营者和做志愿者，完全可以拆开看，经营酒吧是你的工作，但是志愿者是你的服务。比如你经营酒吧是以盈利为目的，做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你不盈利，你还无偿的帮助组织活动，你支持项目的执行也是不盈利，至于有时候需要收回一些经营成本，这些无可非议。但是志愿者该怎么做，作为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志愿者就是志愿者，他一定应该有一个个人吃饭的活，志愿者不能吃空气，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我做这个工作，确实有很大的奉献精神，另外我从大家谈的里面，我个人感觉还有更多需要进一步协调的，比如说安全套，我想省疾控是不是都应该有。因为我觉得，会出现有些地方安全套积压不知道向谁发，有些地方不知道往哪发。

这个问题，需要跟疾控中心，疾控部门要有一些沟通。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形势是越来越好。可以这么说，几年前，我们开这种会，不管多热，都要把门关上。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这么开会，我们报纸上可以这么报道。

反正，我觉得，我们刚才在说的，说的很尖锐，说开来开去，什么时候有公安的人，有政府的人，有疾控中心的人和大家坐在一起，我们就更好地推动了。但是，作为我们自己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在沟通的方面，在我们自己的协调方面，还要主动一些，积极一些。还有一个，我们说资源，经费的问题，我们也想办法去寻求。怎么寻求呢，说不好听，就是削尖脑袋，我怎么跟项目办沟通，从项目办争取经费来支持我们的活动，其实我们真正做活动花的钱并不多，而且大家都很节省。另外，就是你要想办法看看有哪些机构可以支持你，哪些项目可以支持你。作为我们协会也是这样，我们自己也没钱，也是削尖脑袋在钻，有哪些可能，从什么地方争取经费。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就是需要多沟通，我觉得，刚才大家说到了“防艾”的人力资源问题，我觉得咱们的经营者确实是一个特别宝贵的人力资源，而且，从经营者这个角度和需求，我们应该慢慢辐射，要发展更多的经营者参与到志愿工作中来，我们的主管部门，还有我们的社区志愿者组织，都需要提高这样的认识。

就说这么多，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罗维毅：我非常高兴能请我来。虽然我自己关注这个领域很长时间了，但是能为这个领域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我觉得，咱们现在通过讨论，谈出问题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考虑，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我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我现在更多的精力是促进性别平等，就是两性平等。比如说，要让官员从传统男性文化认识到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平等，从国际的经验和国内的经验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开展培训，大量的培训，死气白咧的让他来培训。那么，这个培训怎么做，谁来做，比如说我们给警察举办反对家庭暴力的培训，警察也不乐意参加。但是，要让警察重视，要让上级重视，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得多做培训。我觉得这个策略非常重要。因为从世界范围讲，认为你要他转变立场态度的时候，培训是最好的途径。所以，对于我们这个人群所面临的问题，包括在艾滋病干预中的各种各样问题，他们的误解怎么办？要培训。

怎么做这个培训，培训什么人呢？就有一个对培训人群的评估问题。



上午大家讲到，警察怎么看，媒体报道怎么看，社区民众怎么看。一开始，你知道他对同性恋的歧视态度，偏见很深，你愣找他来也不行。你可以通过你认为是可以沟通的，通过个人关系找来，给他们做培训。但是这个培训中，培训的内容可以具体商量，不是说，你告诉他同性恋怎么样，你可以让他分析，这么说怎么不对，正确的该怎么说。

我觉得培训非常重要，但是怎么操作，我自己今天有个想法，我们自己成立一个关于性倾向平等的培训小组。我们先做一些自己人的培训，然后再来扩展培训范围。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做起来，你让他来自觉提高觉悟是不可能的，这个觉悟一定要从外部去灌输，真的一定要从外部灌输。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行业协会，国家有这个政策，关于行业协会的规定的政策，我们先把政策的根找着，省得你成立的时候说你非法。那我们怎么成立，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谁来做“老大”，就是说，大家都是自己的组织，都有自己的成就，现在联合起来，谁来当这个“领头”的。

我们的女性主义组织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在成立之前，先做自我能力建设，选举或公平选举，不是说这个东西要等着别人做啊，非得我们自己来做，要统一思想。这是第一。

我觉得，成立一个行业协会，作为经营场所老板的行业协会。我觉得先不用考虑同志组织的志愿者的网络，我想，先不要考虑别人，如果在座的都愿意做这个事情，大家愿意推举谁，比如某个老板，你牵头做，你不要考虑CDC怎么想，那些同志志愿者怎么想，青岛的怎么想，北京的怎么想。我们自己愿意做，是合法的做，就行了。

我们做一件事，就要把外在的矛盾，我们自己先化解掉，而不要把自己先陷到这些矛盾啊，是非啊，别人的评价啊，这些不利因素里面去。我不知道我说的意思明白不明白。

真的，我们需要尝试着建立一个可行的机制，比如，信息资源共享，经验交流的机制。我觉得这是必须的。你不能说，今天搞的项目在这儿开个会，明天又开个会，那不行，这个东西得持续下来。我们要做工作，首先要有个组织性，你得有个平台，有个交流的机制，这个机制的建立非常重要。国际社会提到妇女问题的时候，有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建立机制，我们的同性恋人群，要想争取我们的权利和开展我们的工作的话，这个机制很重要的，没有这个机制的话，你做的工作就是在重复地做。那么有一个机制，就有一个统筹，就可以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就不是怎么说呢，就不是原地踏步，或者是重复做工作等等。

所以我特别认为，建立机制特别重要，我先说这么多。

甄里：荣老师的建议非常好。现在的这种会议，往往在会议以后，大家经过商量，就可以先建立一个邮件组。建立一个邮件组不会花什么钱。现在，这一类邮件组已经有很多，但是我们场所经营者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我希望有热心人先从小事开始做起来，通过邮件组先使大家得到信息交流，先沟通起来，通过信息交流商量互相协调的办法。

我觉得，像童老师说的，做同志人群的工作是两手抓，一手是防治艾滋病，一手是发展同志经济。我们在防治艾滋病这方面，大家已经做好多年了，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社区组织规模，网络规模。但是经营者这方面，基本还是自己做自己的，没有什么联合与协调。这里面，可能大家都忙于把自己的经营搞好，多挣钱，而认为是不是组织起来无所谓。咱们说，现在同志社区志愿者工作组开始认识到了，他们的巩固和发展，只着眼自己那个小圈子是不行的，他们需要吸引一些人，一些既热心往往又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朋友参与，他们的参与，对于怎么跟外部的那些机构打交道，怎么搞公关，怎么写各种需要拿出去的报告，比如信息宣传，项目申请什么的，这些朋友比较擅长。我觉得，我们这些搞经营的老板，在这方面不大重视。我们要巩固自己的经营，发展自己的经营，一定也要重视这种能力建设。……我们平时总说圈子、圈子的，今天大家坐在这里，就能感受到，同志圈子不仅仅是大家的顾客，我想，就是说，现在，同志工作各个层次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一体的，在互相支持，互相促进。

我觉得呢，经营者，老板们要和同志工作发展起来的大圈子取得支持，目前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咱们现在就有这样的例子、榜样，像雨奇和龙龙这样，叫什么？两手都在抓，两手都要硬，既做了防治艾滋病的志愿者组织，又做经营，两手都在发展。另外一种，很多地方是这样，要不就是做志愿者工作，要不就是做经营，互相有这种沟通、配合。童老师强调让大家做朋友。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更好的，你也别管别人，你就自己利用自己的条件，也把“防艾”什么的公益项目搞起来。

我自己在这种公益项目里做了很多，什么残疾人啊，环保啊，也有一些公司找我申请公益项目。我对他们说，你在你那个公司里面设立一个公益事业部门，还用你们公司的大章，你拿这个公益事业部找人家要钱做公益事业，你把帐很清楚的分开，井水不犯河水，这都是有机会



的。该赚钱的去赚钱，该公益的就公益，两不耽误。我们的志愿者组织不是都说注册注册很难吗？其实，和我们的经营单位合作，在钱上井水不犯河水，为什么不可以？童老师一直说，谁规定把志愿者和经营者分家了？顺着这个思路，建立邮件组，至少给大家巩固和发展自己，开阔一个思路。

今天大家都说了很多情况，我觉得经营场所这个领域里的情况，实际上都不是很清楚，像艾滋病防治，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拉出来。我觉得，今天是把问题拉出来的一个机会，实际上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工作领域。大家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来看，你的小环境，你自己的小单位能不能赚钱是一回事，大家怎么认识大环境，怎么参与改善大环境的问题，又是一回事。

你们看，苏州他们搞VCT检测，他写了，酒吧、浴室什么的，好几个经营单位在合作，互相配合。他们是不同经营单位，不同的老板之间的合作，这就是同志之间的合作，是同志商业机构之间的合作。那么，这种合作的利益和他们之间的竞争，哪个大于哪个？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是竞争大一些，还是合作大一些？

我听到很多地方的酒吧、浴池，都是互相扎堆在竞争，甚至恶性拆台。我就不相信，你为了打击别人恶意报警，你是把当地的同志消费大环境搞好了还是搞坏了？你真的得到利益了吗？我不清楚。童老师应该做个调查那么经营者之间到底需要不需要合作？我觉得应该需要合作。我希望你们好好商量商量自己搞一个小的合作、协调联盟，我觉得是带了一个好头。我特别同意阿杰说的，要成立行业协会。民政部有个文件说，他们今年的工作当中，主要推的是三个，第一个是行业协会，一个是社区自助组织，第三个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这三个是他们主推的东西，行业协会是在这里面的，你不一定非得说自己是男同性恋的什么什么行业协会，你可以叫一个不太敏感的名字，实际上是你自己人在做。大家都出点钱，请个律师，请些有影响力的人，专家什么的，给你们当顾问。一个是你们自己进行内部的关系啊、价格啊、公益性的工作啊，什么的协调，一个是有了什么事情以后，有律师给你们说话，有专家啊什么人给你们说话。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需要有人尝试着小范围的做起来。

关于其它的问题，什么培训记者、培训警察、培训文化部门，我们都在努力的去做。总之，这个经营场所的保护，现在看来，一个是靠国家的商业体系的，已经成型的法律法规来保护，另外一个，尽量让你们的工作向预防艾滋病靠拢，总的来说，这个工作还是对你们能够有点保护的。

荣维毅：我补充一点。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我觉得一些好的经验，比如说，有些地方，经营者和警察的关系比较好，跟政府部门关系比较好，他们是怎么做的，在交涉，或者说协调的过程中，他是怎么谈判的？有哪些策略？警察的认识是怎么改变的？这些经验，别的地方可以借鉴。当然地区不一样，就像外国经验不能拿到中国一样，但是去谈了还是可以开阔一些思路。当然有些地方关系比较好，有些地方比较紧张，有的可能跟警察的关系比较好，有的不太好，这个也要善于总结经验。我觉得这个东西能够提炼出来，也是我们向上面进行倡导和建议的内容，就是说，我们把好的经验总结总结，表扬表扬，他一听，不是说全对我警察有意见，警察也有可以借鉴的倡导的经验。

蒋宁：我的发言，也许是位置不一样，可能更多从项目、环境、技术角度出发。

我想说第一个问题，上午有一个朋友提议，从国家的角度，要六部委发文，从国家部委角度发文，给经营场所发一个“艾滋病宣传基地”那类的牌子，不太可能，或者说很困难。但是，大连怎么做的呢？他们以大连市的“防艾委”名义，通过CDC来发这个牌子。他们也不是只针对男男人群，而是针对所有的娱乐活动场所，这个牌子下面有公安局、文化局、工商局、卫生局，这四个部门的署名。各个场所的老板都非常愿意接受，也对客人有非常好的提示作用。我想，要从当地的防艾委这个角度来做，就方便得多。至于是针对所有场所还是针对男男场所，可以再讨论。

第二个，是关于VCT检测的问题。实际上，现在大家看到很多单位和部门都在做这一样事情。我们是不是考虑，卫生部门应该把系统的政策、工作先完善，先做好，比如说志愿者暴露处理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政策的细化措施。政策有了，各地针对这个情况有一个细化的措施。否则。检测（的HIV阳性）结果出来以后，都不管了，后续的关怀没有了，只是扩大检测范围，就会积累出更大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思路调整一下，先把后面的做好，就是检测完以后治疗怎么办？包括治疗教育和治疗倡导。我更加关注这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项目管理。我比较关注这一点，就是有些地方出现一些情况，同一个工作组，他可以争取到不同的资源和经费，但是他能做的事情就那么多，能针对的人群就这么多，他完不成指标，也能凑



数向上报。虽然，有的可以干预到新的人群，但是干预的方式单一，还是难达到一个很好的、很深入的程度，不能体现实际的效果。那么，他能多方争取经费，导致资源的浪费。我在想，这是一个项目统筹的问题。我今天做了这些工作，是向省级报，还是向国家报。我们现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司马杰：我是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负责MSM工作的一个项目官员，同时，也是亚太地区同性恋工作的一个顾问。对中国的关于艾滋病和同性恋的工作，今天的会议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会议。我非常高兴能听到经营者在艾滋病预防方面提供的这些真实、宝贵的意见。

很多地方把艾滋病和同性恋划上等号，这是一个事实。不过，艾滋病在同性恋人群中，确实比普通人群的感染率要高。在北京，这个人群的感染率在6%到8%左右。这可能与其他大城市的感染率接近。我觉得经营者参加到艾滋病的预防当中去，但应该维护这些经营者的利益，经营者不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而应该是一个盈利的经营单位。

我们应该思考，怎么样把艾滋病的预防工作结合到你们的经营工作去，你们要开创一些什么方面的工作。

今天的会议，我觉得讨论了三个主要问题：社会歧视、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经营者的网络建设。

今天，大家讨论了在经营场所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艾滋病预防方法，然后怎样认识这些活动，怎么开展这些活动。对交流和网络建设的讨论，主要是讨论了CDC、公安机关和你经营场所的关系，你的经营场所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当地的政府和当地的同性恋之间，需要有哪些交流？

……同性恋为什么需要这些场所，他们去这些场所主要是寻求哪些娱乐的活动？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有娱乐，也要寻求一些性的服务。全球的一些同性恋主要是在桑拿浴室、酒吧这些娱乐场所活动。这些场所的老板们，第一个是要挣钱，这就是你们经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挣钱，通过给大家提供服务赚钱，这个目的，不应该否定。同时，你们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你们在建立这个同性恋平台组织的同时，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艾滋病预防工作也开展起来。……刚才那位，他建议建立一个关于同性恋经济的这种协会，在中国的话，他可能会命名为“中国彩虹协会”。这个组织的主要工作，也在三个方面，主要是交流和网络的建设。就是建立这样一个社区，这样一个氛围，然后给那些经营场所的老板们建立一个交流的平台，一个信息的互通。这些信息

主要是在一些同性恋者和同性恋经营场所的老板之间的信息。然后跟国家和当地的 CDC 之间的协调。

关于安全套方面的问题，安全套的运作在商业组织中起到什么作用，就是安全套的社会营销能不能形成一个方案，这也是需要大家考虑和讨论的。

……

甄里：我说一下，省疾控中心对经营场所的经营者能不能做一个预防艾滋病公益活动的志愿者，在认识上存在着误解。这是对社会志愿者和“志愿精神”的误解，这个误解在社会上普遍存在。在一个和谐社会，社会志愿者就是愿意为大家提供服务的人，但志愿者不应该把公与私、公益性的付出和个人利益极端地对立起来，如果作为志愿者就要绝对的牺牲和奉献，不能搀杂一点个人利益，这是对“志愿者”的认识误区，所以，这样的认识是由长官，或者什么掌握着社会事物主导权的人来决定“志愿者”的资格评价，这不是建设公民社会的认识。

郑煌（上海乐宜机构负责人）：听了大家讲的，我也讲讲今天会议的一些感受。……第一，就是说社群志愿者和场所经营者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志愿者和经营者不应该有什么冲突。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我们并不向经营者承诺我们的工作会给他带来什么利益，如果他能够支持我们工作，我们也不会去影响他们的商业利益。他能和我们合作开展工作，我们的利益是共同的，这没有什么冲突。关于冲突，还是志愿者要领导他们，支配他们，伤害了他们的经营利益造成的。第二，就是关于资源的问题，其实资源的问题，我们在座的一直在跟一些工作组或者是一些 CDC 联系，其实我们的资源并不只能来源于他们，国内外一些大企业，国内外一些艾滋病的基金，也愿意提供给大家。只是我们对这些情况的信息还不掌握，我们争取支持的能力还需要提高。我们很多志愿者小组，都是拿 CDC 的钱，他是个政府机构，从他的角度来说，你拿我的钱，就应该被我控制。我们在上海，我们跟 CDC 都是非常平等的关系，我们跟他有谈判，就是说我们需要他们支持与合作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要求，要求他们提供哪些服务，他们也会答应。大家都知道艾滋关怀，如果查出来的 HIV 感染者是外地的，因为我们是做外地比较多，因为性工作者很多是外地来的，他答应让这些查出来是阳性的在上海接受治疗。关系平等了，技术的问题好解决。第三，就是一说艾滋



病干预，始终强调发放安全套和润滑剂。我个人觉得，艾滋病的干预不一定就是发套，我们有很多的其他的方面来宣传，可能我的场所没有安全套和润滑剂，但是有其他的文字的、表演的等等宣传方式，可能并不需要很多的费用，但是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我就讲这么多。

郭雅琦：如果大家没有什么说的话，我们最后请童戈先生做一个小结。

童戈：我带着非常激动的心情来肯定我们举办的这次会议。如果我不是很闭塞的话，那么邀请我们的场所经营者坐在一起，大家畅所欲言倾诉交流，这是第一次。因此，这也是一个初步的开始。大家反映了很多深刻的、深层次的问题，我们还来不及去讨论更多的具体可操作的事情。那么，我们既然开了这个好头，我们后面要向各位经营者来学习，努力把这个口子撕的更大一点。

另外，我听到有个朋友对我个人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值，我也想和朋友们解释一下我自己。我这个专家身份跟其他的专家身份是不一样的，我是一个“独立人士”。我没有公职，我不从属于任何的机构，我也没有一分钱的工资可以拿。现在，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的一些项目，聘请我来执行，我来做。所以，我除去有些名气，既没有权，也没有钱，我不过是用我讲的赋权精神，给我的脑袋、嘴巴、手里的笔，赋予了自主的权力。我是给咱们人群做义务MB，不过还不能做“大活”，只能做做“口活”和“手活”，动嘴说，动笔写。只要大家信任我，我就愿意为我们同志人群的事情卖上一把老力气。

分析形势，我们既要看到社会对同志的歧视，也要看到社会在同志问题上的进步。无论如何，进步的还是很快的。大家会问：快在哪里？大家不要以为，同志人群的艾滋病工作早就被政府肯定的了。不是。2004年的国际艾滋病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中国性活跃期的男性同性恋的人数和感染率，那是政府第一次正式以政府的态度，明朗的承认了艾滋病对同志人群危害的情况。然后是2005年政府才开始决定做这个事。可是，我还是要强调说，我们要看到的，无论如何，政府的动作很大，基本思路也是正确的。

今天，面对我们的经营者朋友，我提出一个词，就是我已经讲过的“赋权”，赋予的赋，权利的权。权利是谁给的？各位经营者朋友的感受更鲜明，是你们利用法律允许的合法权益，自己给了自己经营权。因

此，我们下一步，如何再坚持我们的这种赋权精神，还是那句话，一手争取我们的平等社会权利，一手来抵御艾滋病的危害。

但在目前，我在去年“艾滋病日”的一个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四化”的问题。就是说，目前，政府开始投入做了，这个工作的格局变了，形势变了，主流的主导性加强了，这个情况对工作的发动非常必要，非常有好处，可是，其实今天大家讲的很多东西，就包括了这个“四化”倾向。

哪“四化”呢？第一个，同性恋的艾滋病化，给同性恋和艾滋病划等号。第二个，我们要警惕，传统道德观念，传统价值观，对于我们的社会歧视的强化。第三个，大家谈到的，那就是用艾滋病的话语，对我们权利话语的弱化。第四个，就是吸收国外的、西方的这些先进经验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把他本土化。

因此，如果说场所的合法经营，场所追求商业利润的这种需求，被笼罩在艾滋病的这个话语当中，一说做艾滋病的事情就必须是绝对“公益”的，就一定要侵犯我们的合法经营权，我们合法追求商业利润的权利，这是我们同志人群的悲哀。刚才有朋友讲到了，谁给他们的衡量标准，非要把我们的经营者在艾滋病干预工作上排除在外，或者只能被高人一等的什么人支配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权利关系问题。

……我们还要努力做好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和公安等方面的协调。这里的协调呢，究竟是你个人关系起作用，还是政策，或者政府部门之间根据国家政策起到了协调作用？因此，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尤其我们的专家们，必须促进艾滋病问题的政策环境改善。没有这个改善，是不行的。

今天，大家还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媒体的问题，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媒体对于我们是双刃剑。他可能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舆论效应，也可能给你带来负面的影响。我们到现在，没有在同性恋问题，在同志的问题上很好地教育媒体，没搞过。我去年完成了一个调查报告，里面提到了学术和媒体的话语霸权问题。

几年来，我始终在强调，抵制艾滋病危害不是同志人群需求的全部。在我们抵制艾滋病危害，维护我们健康权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是不是我们做艾滋病的工作，就是必须服从一种权利的制度，一种利益的制度，我们自己在这里头，权利在哪里？第一个，作为一个社会公民，我维护社会公民的健康权，是理直气壮的。第二个，我们有一个平等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权利。第三个，大家要注意，我们还有着在艾滋病问题



上，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对于疫情的知情权，为什么一场SARS倒了两个高官，因为他在SARS问题上，剥夺了人民的知情权。第四个，我们还有我们的民主监督权。现在，这一切刚刚开始。我们如何把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作为一个目标，作为一个载体，作为提高我们争取这些权利，满足我们多元需求的一个过程，还需要我们付出漫长的积极努力历程。

……

因此，我们的经营者朋友们，一方面要积极投入做艾滋病的工作，一方面要保护自己的经营权利。

谈到行业的协调，这是我非常期望的。这个又不是别人可以插手的。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谁大家自己的事情自己来决定，这才是公民社会的理论，才是民主社会的理论。

……

郭雅琦：非常感谢大家在周末的黄金时段放弃自己的业务，来参加我们的座谈会，也感谢这些专家能在百忙当中来听取大家的意见，感谢所有来参加会议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座谈会，我们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这里，这两天我也非常的紧张，但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轻松了，因为看到大家这样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对这个座谈会能不能成功，已经有了把握。……今后，大家有什么需求，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们联系。好，散会。

《分享与交流》

是非卖品

欢迎索取

欢迎赞助

感谢福特基金会对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的支持

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

Beijing Gender Health Education Institute (BGHEI)

电话 (tel): 010—88517980 传真 (fax): 010—68470251

E-mail: bghei@yahoo.com.cn

通讯地址: 北京 100081 信箱 51 分箱 (100081)

Mail address: Mail Box 100081, No.51, Beijing China (100081)